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袁振国 谢维和 丛书主编
徐 辉 张斌贤

教科书政治学

M·阿普尔 主编
L·克利斯蒂安-史密斯
侯定凯 译
袁振国 审校

The Politics
of the Textbook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教科书政治学

袁振国 谢维和 丛书主编
徐 辉 张斌贤

The Politics
of the Textbook

M·阿普尔 主编
L·克丽斯蒂安-史密斯
侯定凯 译
袁振国 审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科书政治学/(美)阿普尔,(美)史密斯主编;侯定凯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

ISBN 7-5617-4231-2

I. 教... II. ①阿... ②史... ③侯...
III. 教材-政治学-研究 IV. G4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8240 号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教科书政治学

主 编 M·阿普尔 L·克丽斯蒂安-史密斯
译 者 侯定凯
策划组稿 金 勇
责任编辑 陈锦文
责任校对 王丽平
封面设计 高 山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宜兴德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6 开

印 张 23

字 数 334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一次

印 数 6000

书 号 ISBN 7-5617-4231-2/G·2443

定 价 36.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丛书主编 袁振国 谢维和 徐 辉 张斌贤

选编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朱杰人 阮光页 张斌贤 金 勇
袁振国 徐 辉 谢维和

内 容 提 要

教科书是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它是学生接受知识的重要途径。表面上看,教科书传递的知识是中立的,但实际上它们只是“正式知识”的传承者。这些知识是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参与教科书选择的各种因素呈现的,是决定教育政策的学校、政府和其他社会部门各种现实力量的一个缩影。

《教科书政治学》中的文章分析了影响学校教科书出版、发行和采用各环节的各种因素。这些文章同时强调了教科书的双重特征。一方面,教科书可以看作是社会强势群体用以建立政治和文化秩序的道德体系;另一方面,教科书也可以看作是社会大众揭露学校知识和选择性传统背后利益冲突的手段。

虽然这些文章分析的角度不同,但作者们都关注学校作为权力斗争场所的问题。其中一些作者是国际知名的课程和教育政策问题方面的专家。有些文章分析了教科书出版中包含的文化、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因素;有些文章阐述了进步作家、教育工作者和劳动人民是如何改造教科书的;另有些文章则剖析了学生在使用教科书的过程中是如何选择、解读和抗拒那些“合法知识”的。综合这些文章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文化政治学揭示了当前关于教科书问题的斗争,而教科书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争取学生的心灵世界!

// 总 序

总

序

学术交流是学术发展和繁荣的最重要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陆续翻译引进了一批批外国教育理论著作,这对促进我国教育研究的发展、提高教育研究的水平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教育理论著作翻译引进的工作有所减弱,在已有的教育理论翻译作品中,也较多集中于单科性作品,综合性较强的作品较少,有也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作品。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经常被人们引用的作品,由于没有系统译介,以讹传讹的也不少。为此,我们筹划了这套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选题的重点是思想性、综合性较强,学术覆盖面较广,较具原创性的作品;时间上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为主。虽然有些作品翻译难度较大,但我们将不避烦难,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我们希望学者同仁共同关心这一工作的进展,为丛书出谋划策,推荐作品,参与翻译,不断提高这套丛书的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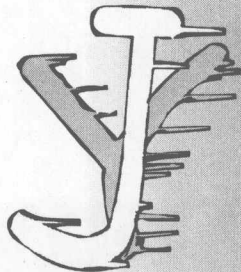
丛书主编

袁振国(华东师范大学)

谢维和(北京师范大学)

徐 晖(浙江师范大学)

张斌贤(北京师范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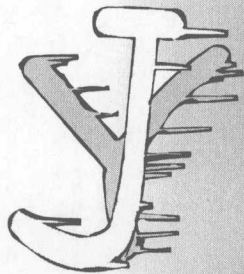


译者序

现代社会教科书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是双重的：一方面，学生可获得的信息渠道日益多元，使传统教科书的权威性受到挑战，对教科书批判性的学习，成为学生成长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教科书依然是课程的中心环节和学校教育的重要载体，教科书的地位同时也得到教师和考试制度的权威的强化。如今不断深化的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一步给教科书的内容、使用和外部环境都带来了剧烈的变化，教科书在学校教育的地位及其对学生身心发展的影响力需要重新评估。而这方面的研究至今还未被系统地纳入我国教育研究者的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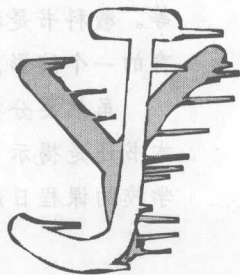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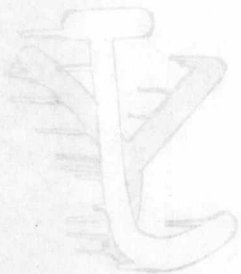
我们使用的教科书来自哪里？这些教科书为谁的利益服务？教科书传达的意义背后存在怎样的竞争和矛盾？这些关系对教学活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教师如何在保持自己教育理想的同时又能出色地使用这些教科书？本书的作者们普遍认为，教科书是一个政治的产物。教科书传递的只是“正式知识”(official knowledge)，而非中立的知识，因为教科书是社会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作用的结果——它们要体现教育重要决策者的意图；要体现教育专家的思想；要为出版社的利益服务；也要为那些帮助学生通过标准化考试的学校和教师利益考虑，等等。教科书是教育决策者、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影响学校教育的一个缩影。

虽然要分析教科书在更为宏观的社会背景下的意义是困难的，但本书还是揭示了关于教科书对教育活动本身可能的影响，即教科书使学校的课程日趋标准化，但也妨碍了教师技能的提高。教科书传递给



学生的关于性别和社会阶层的信息与他们现实生活的情况相矛盾,而教师则愈加远离对课堂教学的专业控制权。教科书试图传达的信息远非学生能够把握,因而也把教材与人性和人的潜能的张扬隔离开来。教科书表面上的便捷性和背后的权威认证,剥夺了学生和教师分析和实践日常事务的能力,教科书在人们的心中建立起一种“一切不可改变”的意识,从而否定了人们作出进一步探索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教科书从编写、出版、选择到使用的过程,反映了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关系,其中少数精英人物占据了主导,他们只是把有限的教科书权力交给了教师和家长。在强调教科书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实用性的今天,关注教科书对教育活动产生的潜在或现实的影响是必要的。

不能期望通过理性分析改变教科书制度的现状,但保持对教科书问题复杂性和潜在影响的敏感,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教科书使用中宗教式的盲从,同时在面对教科书世界和现实的冲突时也可以避免些许尴尬。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本书原版时间较早,我们却发现它还是能给予所有关心教科书问题的人们以方法论的启示。



目

录

目

录

总序 / 1

译者序 / 1

第一章 教科书政治学 M·阿普尔, L·克丽斯蒂安-史密斯 / 1

第二章 教科书的文化及商品属性 M·阿普尔 / 27

第三章 图书与高科技——电脑, 性别问题与图书出版 L·克丽斯蒂安-史密斯 / 50

第四章 来自朋友的一些帮助: 出版商、抗议者以及得克萨斯州教科书政策 J·丹·马歇尔 /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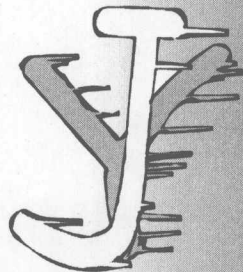
第五章 当前教科书中种族、阶级、性别和残疾人问题 C·史利特, C·格兰特 / 92

第六章 重申反抗之声: M·泰勒的小说 J·塔克塞尔 / 134

第七章 我们历史上的批判性教程: 美国社会主义主日学校的课程 K·泰特鲍姆 / 165

第八章 世俗的《圣经》: 《迪克和简》(*Dick and Jane*) 读本的天主教修订本 A·路加 / 205

第九章 读者、教科书和背景: 校园爱情小说 L·克丽斯蒂安-史密斯 / 237



第十章 教科书权威、文化和文化素养的政治学 S·阿罗诺维茨,

H·吉鲁/265

第十一章 教科书:国际比较的角度 P·阿特巴赫/300

第十二章 培养民主意识:格林纳达教科书的内容和意识形态(1979—

1983) D·朱尔斯/319

后记/355

第一章

教科书政治学

M·阿普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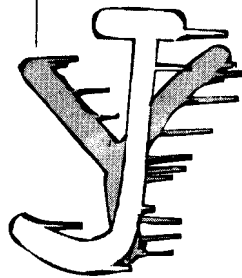
L·克丽斯蒂安-史密斯

谁的知识最有价值

现实不是围绕着既定路线来运行的。事物是什么,怎样运行,如何演变,这些都不是预先安排好的,而是社会的产物。即使我们谈到安排我们日常生活的制度(比如,学校教育)时也是如此。对一些人而言,学校教育被看成一个巨大的民主发动机——它具有开阔眼界、保证社会流动的可能性等功能;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学校教育的实际情况则完全不同。它可能被看成是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或被看作是文化危机的具体表现,它的课程和教学实践制度威胁到了学生的道德领域。

虽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上述关于学校教育的结论,但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后者的立场体现了一种很敏锐的洞察力,它看到了在斯宾塞著名问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背后,存在着另一个更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即“谁的知识最有价值?”

过去的二十年中,在回答“在学校谁的知识被社会认可”这个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①虽然有很多问题仍有待解决,但我们对学校知识和更广阔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比以前有了更多的理解。然而,人们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在确定“用谁的文化去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教科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对教科书的学术研究难以胜数。^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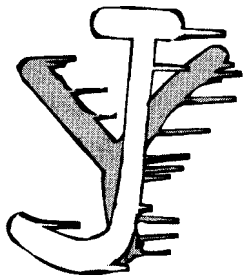
但直到现在,大多数研究仍旧很少有涉及政治学方面的,对于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仍然可用多年前 C·赖特·米尔(C. Wright Mills)提出的“抽象的经验论者”这一概念来概括。这些“社会探寻者和集大成者”并不关心他们周围存在的不平等关系。^③

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因为教科书不仅仅是“事实”的“传输系统”,它还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斗争及相互妥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教科书是真正由人们根据自己的真实兴趣构思、设计和创作出来的。它的出版发行受到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市场、资源、权力等因素的制约。^④不同志趣的群体对教科书的内涵及其使用方式展开争论,教师和学生也参与到这场争论中。

正如有人在一套丛书中所提出的,将学校课程看作是中立的知识,显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⑤相反地,被认为是合法的知识,恰恰是复杂的权力关系以及身份等级、种族、性别、宗教团体不断斗争的结果。因此,教育和权力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凸显了教育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妇女、有色人种和其他弱势人群通过斗争,把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写入了课程。这一关系在历史上如此,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在保守的复兴思潮冲击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受到经济危机和在意识形态与权利关系中危机的驱使,教育和权力的关系在过去十年中变得更加突出。“独裁民粹主义”到处蔓延,新右派在将自己的权力运用于学校教育的目标、内容以及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⑥

在课堂之外,右派的运动从未停止过。中央集权的教学和课程的最新计划,经常以“民主”改革的幌子巧妙地加以掩饰,这样的趋势在新的管理方案或私有化方案出台之前是很难停止的。在美国,我们可以从以下这样一些事例中印证这一趋势:对师生进行强制性能力测试的提议;呼吁回归基础(多少带有浪漫色彩的)课程;限制教育在服务工商业方面的目标;建议采用“教育券”和“选择学校”计划;对来自右派的道德和价值合法性质疑的施压;政府授权的关于“自由冒险精神”方面的规定等等。更多的迹象表明,在英国也有类似的趋势,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加明显。

所有这些引发了学校的抵抗运动。民主办学的进程虽然有所减缓,但仍在饶有兴趣地进行。通过丰富的实践和政策倾斜,社会团体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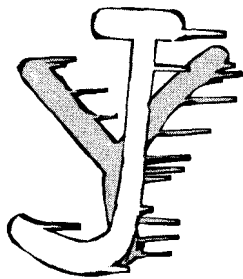
教师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力,他们可以更自由地选择教材、制订课程和教学策略、运用资金、管理学校以及开发更灵活的评价体系。这些为人们保守教育的复兴进程保持乐观态度提供了理由。^⑦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积极的迹象,“新右派”仍可以重新界定传统的政治和文化主题。在这一过程中,它通常可以动员多数群众成为他们的拥护者。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守团体对公立学校日益不满。许多家长和其他一些人,不再相信公立学校及其教师和官员能就教什么以及怎么教等问题作出“正确”的决定。而越来越多的新教会学校、对学校事务的审查制度和对教科书的辩论等,以及越来越多的家长宁愿让孩子在家学习也不愿把他们送到公立学校的趋势,都表明政府支持的学校教育正逐渐失去其合法性。^⑧

这背后的意识形态通常是非常复杂的。它是这样一些元素的组合:“传统的家庭观”、合乎传统价值观的性别角色期待、虔诚的宗教信仰。其中包含了维护资本主义经济、爱国主义、“西方传统”和反共产主义以及对“福利国家”的极度不信任。^⑨当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到学校教育中时,其结果可能非常简单,简单得就像对任何一本书或一份学生作业表示不满一样。另一方面,这个结果可能会导致重大的冲突,它的威胁可能远远超过我们通常对学校教育的争论,而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

就后一种情形而言,没有一个地方比美国西弗吉尼亚的卡那瓦郡更出名的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该地区围绕着学校应该教什么,谁来决定教的内容以及应该以什么样的理念来指导教育计划等内容,展开了一场富有争议的讨论。一小部分保守派家长、宗教领袖和商业界人士,对于获准在当地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内容和设计持反对意见。争论由此开始,很快就引发了一场学校联合抵制的暴力和社区的分裂活动。这场运动造成的创伤至今尚未愈合。

有许多重要因素加剧了西弗吉尼亚的紧张局势。乡村学校最近已经联合起来了,阶级关系及城乡关系愈来愈紧张。农村家长很少能参与对教科书的选择,而且不能参与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决策过程,这些更加疏远了城乡关系。此外,具有强烈独立倾向的宗教文化传统、原教旨主义的宗教传统、经济萧条的历史,共同促成了这个动荡局面的形成。



最后,卡那瓦郡是全国性右翼团体活动的集中地。右翼团体在道德、法律和组织方面,向当地的保守主义活动分子提供了支持。^⑩

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围绕将什么编入教科书中、将什么排除在教科书之外的“正式知识”(formal knowledge)的争论,事实上蕴涵了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和历史。围绕教科书所暴露的冲突,往往反映出权力关系上更深层次的问题。它们涉及人们在知识方面最看重什么的问题。并且,正如卡那瓦郡一样,它们能迅速将那些冲突升级为更深层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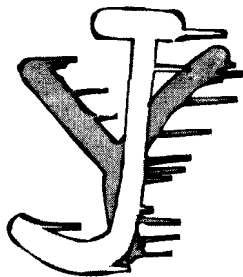
然而,教科书本身的意义也非常重要。通过教科书呈现的内容和形式,我们可以看出现实世界是如何构成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出浩如烟海的知识是如何被选择和组织的。教科书体现了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所说的“有选择的传统”(selective tradition)的内涵是什么——它只是某些人的选择,只是某些人对法定知识和文化的看法。通过这样的传统,某一人群的文化资本获得了合法地位,而另外一群人的文化资本却无法获得这样的地位。^⑪

事实上,教科书是面向未来传达的一种信息,也是关于未来的一个预言。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它介入课程的程度,绝不亚于有组织的社会知识体系。它参与决定社会上什么样的知识被认为是合法和真实的。它帮助制定关于真理的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帮助确立一个重要的参照,人们借此了解“真正”的知识、文化、信仰和道德的本来面貌。^⑫

虽然有人认为教科书参与了意识形态和本体论的构建,但是它仍在许多重要方面使人们产生误解。因为不是“社会”,而是一些特殊群体编订了这些教科书。如果“我们”(we)一词,仅仅意味着在我们所有人,在什么知识才是正式知识上已达成了一致看法,那么“我们”事实上并没有编写出这种课程的教科书。“我们”一词经常被泛泛而指。

正如弗雷德·英格利斯(Fred Inglis)雄辩地指出的那样,“我们”一词

抚平了斗争所造成的很深的创伤和裂痕,这场斗争是围绕如何运用具有权威性和措辞技巧的“我们”一词而引起的。(教科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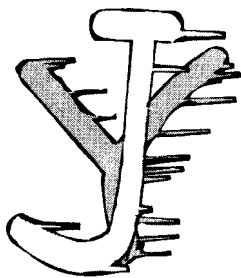
不是戏剧性事情的阐述,而是一个智力战场。这场争夺文化权威的战争是不易控制的,这是一场持久而激烈的战争。^⑬

举例来说,1930年美国的保守团体针对一本非常具有进步性的教科书展开了一场斗争。这本书是哈罗德·拉格(Harold Rugg)和他的同事们共同编写的《男人及其变化的世界》(*Man and His Changing World*),它遭到了“全国制造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美国军团”(系全美退伍军人)(the American Legion)、“美国人广告联盟”(the Advertising Federation of American)和其他一些“中立”团体的一致抨击。他们指控拉格的书具有社会主义倾向,是反美国、反商业的等。而这场保守派的斗争成功地迫使各学区的学校收回教室和图书馆中所有拉格的书,以至于此书的销售量从1938年的近30万本减少到1944年的约2万本。^⑭

当然,今天我们可以对这些图书持保留意见,可以认为其中具有性别歧视的色彩。但是,在拉格事件中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在教科书中体现政治关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如今围绕教科书的热点是:教材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在决定我们应该教什么的问题上究竟扮演怎样的核心角色?教材的真实效力和设计是怎样的?所有这些,都与许多国家在过去很长时期内的不同时期所关注的问题不谋而合。

在如今的学校教育中,很少有领域能像教科书一样,遭到审慎检查和激烈争论的。基础教育理事会(the Council for Basic Education)的A·格雷汉姆·唐(A. Graham Down)对此作了非常清楚的描述:

教科书,或多或少地支配着学生所学的知识。他们确立了课程的框架,而且通常是确立了大部分科目中一些必修的知识。对许多学生来说,教科书是他们惟一能读到的书籍,也是他们第一次并且是惟一的阅读机会。在公众看来,教科书是权威的,是准确无误和十分必要的。教师们则需要依靠教科书来安排自己的教学内容。但是充斥我们学校的现行教科书体系,就像是特洛伊木马——它们只是外表华丽的一堆印刷品,而其间的文字使我们国



家的年轻人思想僵化呆滞,还使他们产生厌学情绪。^⑮

这段陈述和伯恩施坦(Harriet Tyson-Bernstein)的陈述一样有力。他是新近一项叫作“美国教科书的失败”(America's Textbook Fiasco)研究的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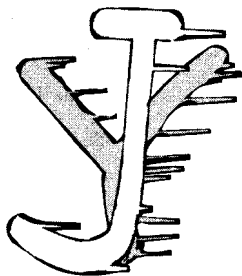
试设想一项设计完美的公共政策体系,它所编写的教材使学生产生迷惑和误解,产生极度厌烦的情绪,但同时却让所有参与这一过程的成年人都感觉良好,不管是从他们自身的立场,还是从别人的立场。尽管市场上有许多优秀的教科书,但事实上,出版商和编辑们还是在公共政策和实践的驱使下编写了这些教科书,这些书中无根据的论断使学生的思想产生混乱;误传误报使学生产生误解;毫无目标和枯燥乏味的写作方式使学生极度厌烦。^⑯

教科书的规范或解放

为了理解这些批评,理解教科书为什么这样编排,为什么教科书反映的是“这些人”的观点,而不是“另外一些人”的观点,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图书的世界和经济的世界是不能分离的。图书不仅仅是文化的产物,同样也是经济的产物。尽管教材是传授知识的媒介,它们仍旧必须在“市场上出售”。^⑰这个市场——尤其是国内和国际教科书出版市场,在政策上是反复无常的。在卡那瓦郡的经历极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教科书经常陷入一系列复杂的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之中。教科书出版行业的竞争十分激烈。在美国,教科书生产是一个置身于千变万化的资本市场的商业性产业,而这个市场“营利性”(bottom line)决定了这个产业将发行什么图书及发行多长时间。然而,教科书的发行,不单单被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所控制,它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关于教科书的审批政策——这只强有力的有形的“政治”之手——的控制。^⑱

美国有将近一半的州——大部分在南部和“阳光地带”——都成立了教材审批委员会。一般来说由这些委员会来决定该州学校将选购什



么样的教材。在这种情况下,出版商考虑到经济得失,都竭尽所能确保他们的书在通过审批的书目上有一席之地。因此,在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等州出售的书,决定了在全国各地出售什么样的书,也决定了什么样的知识是合法的。毫无疑问,在这些州也出现了关于教科书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辩论,这与卡那瓦郡所面临的局面很相似,它对“什么样的知识和谁的知识应当被采用”这一问题具有十分现实的影响。还有很明显的一点是,在这一问题上,卡那瓦郡受到更大范围的关于知识合法性斗争的影响,同时,卡那瓦郡也影响着这场斗争。

然而,经济与政治现实不仅决定了教科书在国内的出版格局。在国际上,几个主要的教材出版巨头,不但控制了资本主义大国绝大多数的图书市场,而且还控制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图书市场。文化霸权成为全球成千上万的学生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造成这样的局面,部分是因为跨国公司从经济上垄断了语言和出版业;部分是因为在前殖民地国家成长起来的“新贵”(new elite),他们从意识形态和系统的角度,控制了国家的政治、文化。^⑬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在“中心”和“边缘”国家之间以及各自国家内部,关于合法知识和教科书的更为复杂的关系和斗争。

我们想要强调的是,正如一些新兴国家、卡那瓦郡或拉格的教科书的情况那样,这些纷争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关于教科书的模式和内容的争论至今没有减少。事实上,特别是在美国,这一争论正在变得更加激烈。关于学校应该教授什么、如何教授这些知识以及如何评价这些知识的辩论,受到了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氛围的影响。现在美国的学校面临巨大压力。他们要提高教科书的标准、增加教科书的“难度”、实现课文内容标准化、强调教科书中“美国式”的主题(爱国主义、自由冒险精神和“西方传统”)以及将教科书内容与州及全国性教育考试联系起来。

不仅美国感受到这种压力。同样,在其他许多国家,教科书的问题正成为意识形态和教育争论的中心。例如在日本,政府批准了右翼的历史教科书,而这些教科书篡改了日本野蛮侵略及占领中国和朝鲜的历史,粉饰其侵略行为,结果不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而且在

